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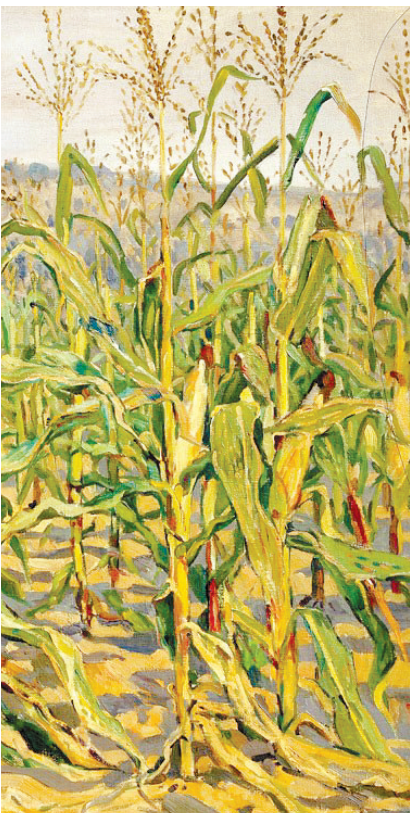
副刊

在生活中,有的是吃人的人,有的是被吃的人,但是这两种人可以转化,羊渐渐可以转成狼;狼呢,渐渐地到一定阶段也可以转变成羊。就好像是善恶一样,没有绝对的善恶,你这人特别的善良,那也有特别不善良的地方。最可笑的还有许多人,在羊向狼转化的时候,转化成一半,停在那儿了,半羊半狼,自己也闹不太清楚,到底是羊还是狼。

——刘震云

疯老头

黄诚专



其实,他并不疯,他有他自己的名字。以前,村民都叫他王大爷,可他近几年,常常做出一些让村民料想不到的事,不敢想,不敢干的事,村民才叫他疯老头。

就说,村里那几百亩山地,准确地说,是三百亩,谁都不敢承包,他却承包下来了。从那年开始,村民们便叫他疯老头了。

为这几百亩山地,疯老头投入不少的精力。翻地、播种、施肥、培土、收割等一连串的工序,大多都靠人力来完成。这么多的玉米,疯老头当然一个人干不了,都是请人干。从翻地到收割,一轮下来,减去人工费、承包费、玉米种、肥料等开销后,就所剩无几了。

看这样的收成,不想办法减少开支,是再也承包不下去了。眼下,收完玉米留下的秸秆,清理就是一个大问题。往年,要把秸秆清理干净,都得再请一帮人来干,再付一笔不小的工钱。屈指算来,这次,如果再请,就连本也打水漂了,来年的种子钱就成

问题。

疯老头一直为这事头疼,头再疼他也一直在想,弄得他整日吃不香,睡也不香。后来,疯老头亲自进一趟城,谁也不知道他进城干什么去了。过几天才知道,疯老头进城原来是去找报社记者,会见了记者之后就急匆匆赶回来了。

疯老头回到家就准备了好多木棒,木棒有人手臂那么粗,两米那么长。疯老头准备好的木棒全都拿到他的玉米地,当然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,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。

大约一个星期过后,村里来了好多人,他们直奔疯老头的玉米地,到地里就气势汹汹地抡起木棒来。可他们拿起木棒并不对打,而是一个劲地打在疯老头的玉米秸秆上。他们打得出汗淋漓,气喘吁吁才善罢甘休。有的稍休息一会又继续打起来。

村民们都看傻眼了,都说,他们一定是疯子,不然不会这样疯干的。以后的日子,疯老头的玉米地来了一拨又一拨人,把玉米

秸秆都给打得稀烂,疯老头站在一旁,傻看

后来人们才知道,这是疯老头给他们设下的陷阱。再后来人们才知道,这是疯老头开的发泄农场。这玩意,在外地早些年就兴起来了,专门让城里的疯子来发泄,生意十分火爆。看来疯老头收入并不薄,看来疯老头这次真的发达了。不再种玉米了。

可后来,村民知道疯老头一分钱都不收的时候,大家对他更深层次地猜测,疯老头这次是真的疯了。城里人知道疯老头发泄农场分文不收,像洪水一样蜂拥而入,疯老头准备的木棒都不够用了。不出一个月,地里的秸秆像一阵风,一下子全消失了。疯老头这回笑了:我傻,哪有请人来清理秸秆还收钱。是你,你愿么?再说,翻地播种时节到了,我不这样做我怎能安排来年生产。告诉你们吧,我这一招,叫欲擒故纵,以达到双赢。双赢,你们知道么?那当然了,我这一赢必定是大赢。亏本生意我可从来不干。我把这年纪了我可亏不起。

外公

孙平凡

外公是在淮海战役后参加剿匪时留在当地工作的。1977年3月在一线检查农业工作时因心肌梗塞去世。留给我们的遗产只有一台“风雷”牌半导体收音机和一支“新农村”自来水笔和一块“上海牌”手表。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是富有的永恒的。

从我出生之日起,他每月给我家寄15块钱,直到1976年我们兄弟三人长大成人后才停止,同时也坚持每月给我们寄一封家信,在信中教育我们要学雷锋、张思德、焦裕禄等英雄人物,嘱咐父母:“孩子要多吃点苦,培养孩子高中毕业成为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有文化的年轻有为的人。”

有年,外公回老家,有位家族长辈来看外公,外公对母亲说,“对这样朴实的老乡一定要热情招待,再困难也要做三个糖打蛋加上点炒菜,让她吃顿像样的晚茶。”老乡到家后,外公让母亲做了很多好吃的菜,特地买了一斤普通的山芋干酒,还请了几位邻居。

外公很有趣,有次一个闷热的夏季,我印象深刻的是外公提出的选择外孙媳妇的条件,要看人家秧苗栽的直不直,秧田有否杂草等等。

外公一直没老,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对于读书人来说,书就是最重要的资产,书读半生,再如何寒酸窘迫,总会积下一点藏书。将它们一排排立在书柜里,心里也会踏实许多,时不时再拿出来摩挲一番,多少不如意都会立刻烟消云散,天地为之一宽。但这种快慰的事,许多时候只能是一种奢愿,难以满足。反而是另一种情况却常常发生,那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毕生所藏之书流离失所,而自己却只能束手无策、徒叹奈何。这种藏书之殇,这种无能为力之感,伤心欲绝之痛,非过来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。

一代国学大师钱穆爱书如命,薪水所得,尽耗于书。抗战爆发前,他在北平与各书肆老板无不相识,藏书达五万余册。他时常谈笑说:即使学校解聘我,我也可以摆一旧书摊,不愁生计。抗战爆发后,钱穆匆忙南下,行前将二十余箱书籍交于某人保管,但辗转之下,这二十余箱书籍却被某书商以百石米价买去,最终流散民间,杳无音信。世事变幻,殊难预料,十几年后,钱穆寓居香港,偶然得到《资治通鉴》一部,赫然发现该书竟然是其二十余箱藏书中的一部,并且该书对他还有着特别意义:乃是其亡兄所遗之物,书中多有先兄手迹。友亡书散,睹物思人,诚为钱氏晚年一大叹嗟。

藏书之殇

李寅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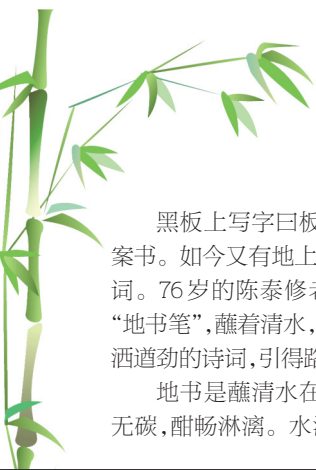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钱穆的藏书之殇是因为世事造化无常,阴差阳错的话,那么孙楷第的藏书之殇却想来有一种愤怒之感。孙楷第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“现代第一人”,他藏书万卷,且多有批校,是其平生学问心血所寄。文革爆发后,万卷藏书无处可存。无奈之下,他只得将万卷藏书连书架一起以四十元贱价卖给了琉璃厂旧书店。文革之后,他孙楷第找到旧书店,想要赎回藏书,但书店重利,坚持以现价回赎。万卷藏书,价值不菲,孙氏无能为力,于是投函向有关部门求助,书店得知消息竟然提前将孙氏所藏之书拆分变卖。孙氏为此痛心疾首,临终前,友人前

去探望,他已经不能言语,犹在手心写一“书”字,以表白其终身恨事。商人重利,书生抱恨,活生生一幕现代悲剧。

走笔至此,我不禁抬头起望:我这一隅陋室,亦有数千藏书,虽然没有什么珍本善本,但却本本都是我于街头巷尾,不辞辛苦淘来。每一本书我都有一个故事可讲,每一本书也都留有我或长或短的笔迹书痕。在接下来的岁月里,在我将为生计、为前途奔走的无常里,我也会遭遇钱穆、孙楷第一般的境况吗?红尘醉眼之中,究竟是书殇还是人殇,恐怕再也搞不清楚了。后人读史至此,焉能不废书长叹?

“地书”老人

李庭明



黑板上写字曰板书,趴桌上写字叫案书。如今又有地上写字的“地书”新名词。76岁的陈泰修老人用海绵制成的“地书笔”,蘸着清水,在地上挥就一幅潇洒劲的诗词,引得路人啧啧称赞。

地书是蘸清水在水泥地写字,环保无碳,酣畅淋漓。水泥地不湿是不可或

缺的条件,所以,只要未被瑞雪覆盖。地是干的,每天至少两次地书四个小时以上,他是2008年3月开始到目下,无论春夏秋冬、酷暑严寒,持之以恒、坚持不辍。

陈泰修地书的底蕴,源于书法的功力。年轻时出差巧遇老省长张恺帆题字,他感触良深,始练书法。几十年的苦

练,他的字在书法界颇具影响,成为安徽省书法协会会员。转为地书,与他晚年的传奇经历不无关系。

从不生病的陈泰修2007年底突发高烧,在安徽中医学院住院期间,医护人员切开他的气管全力抢救,命悬一线,病危通知书共下九次,但终究活下来了。医生嘱咐他需卧床三年,长期坐轮椅,有望慢慢恢复。有气无力的陈泰修只得告别他终生酷爱的案书。

可是他又放不下酷爱的书法。于

是,每天坐轮椅到包河公园散心的时候,他总是手指不停地在膝盖骨、肚皮上划拉,再以后拿棉花蘸水在包河公园水泥地上试行指书,磨炼意志之不畏困难,四肢恢复感觉,神奇深呼吸是气功,身体慢慢硬朗。满以为轮椅余生却有了行走自如的一天。

海绵当狼毫,废弃的拖把把当笔杆自制成眼下一米多长的地书“笔”。一发而不可收。他的地书,间架合理,苍劲有力,观者众,流连忘返。